

夏莉萍 梁晓君
李潜虞 熊志勇 著

当代中国外交 十六讲

Sixteen Lectures on Diplomacy
of Contemporary China

本书出版获得外交学院外交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

夏莉萍、梁晓君
李潜虞、熊志勇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夏莉萍, 梁晓君, 李潜虞, 熊志勇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12-5366-1

I. ①当… II. ①夏… ②梁… ③李… ④熊… III. ①外交—
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1700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罗养毅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作 者

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
Dangdai Zhongguo Waijiao Shiliujiang
夏莉萍 梁晓君 李潜虞 熊志勇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排 版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720×1020毫米 1/16 24印张
330千字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366-1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讲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形成.....	15
第二讲 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外交.....	37
第三讲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58
第四讲 坚持一个中国.....	80
第五讲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外交努力.....	102
第六讲 中苏关系的恶化.....	124
第七讲 发展与“中间地带”的友谊.....	147
第八讲 中美关系的缓和.....	167
第九讲 反对霸权主义.....	189
第十讲 奉行不结盟政策.....	212
第十一讲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34
第十二讲 “一国两制”争取国家统一.....	258
第十三讲 扩大国际影响.....	280
第十四讲 睦邻外交.....	304
第十五讲 与美欧等国关系的曲折发展.....	324
第十六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347
后 记.....	372

绪言

常言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被视为外交学的“公理”。根据外交学著作的定义，“外交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①代表国家的政府通过外交来维护本国利益，而政府对利益的认定往往取决于内政。内政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内事务，二是指对国内事务的处理。当政府根据国内情况，通过决定制度、体制和政策来处理国内事务时，它就形成了对本国利益的认定。因此，它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也要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一般情况下，外交政策会受到国内政策的影响，但它有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国内政策。这往往是因为政府认为国际上出现了足以影响国内局势的情况。中国自19世纪中叶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以来，这个公理一直为中国外交所体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紧密相连，不仅表现了内政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发生了国内政策的制定受对外关系影响的情况。前者如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中国国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曾一度严重损害中国对外关系。后者如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国政府曾长时间地认为新的战争迫在眉睫，影响了对经济建设的部署。因此，简要地回顾建国60多年的历史，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

^①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5页。

一、继续革命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一方面面临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还要抓紧完善政府体制和恢复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的巩固打下基础。

1950年海南岛、云南、四川、新疆等地相继解放。1951年5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中央政府代表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大陆领土的统一基本完成，但台湾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在40年代末内战中被打败的蒋介石逃到了台湾，控制了台湾及其附近的岛屿。1950年3月，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的职位。国民党一方面巩固自己在台的统治，另一方面纠集在大陆上的残余力量不断地袭击大陆沿海地区和在内陆兴风作浪。中央政府则在准备解放台湾，1950年上半年之前，军队已开始向东南沿海集结。

在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继建立。从乡到省还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老解放区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从1950年到1953年，对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既为巩固农村新政权，也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历经多年战乱，中国经济水平极为低下，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仅27美元，而整个亚洲平均为44美元。中央政府还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基本稳定。

就在中国政府忙于解决内部问题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马上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当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境时，中国国家的安全面临重大威胁。中国领导人考虑再三，于10月8日宣布派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一决定不仅打断了了解放台湾的部署，而且给国内政治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全国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目的在于消除在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除美国在思想领域的影响。与此同时，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清除了一批外国间谍，也扑灭了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在朝鲜半岛，交战双方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在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自此，中国又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来解决国内问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动员全国人民完成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从1952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上半年已建立互助组993万个，初级合作社48万个。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各地视察之后对这个速度还不满意，批评有关领导是“小脚女人”。为此在全国展开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开始支配人们的头脑。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带动了手工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原来8万多个私营工厂，除极少数并入地方国营企业外，组成了3.3万个公私合营企业；原240万户私营商店，除少数转入国营或合作社外，其余组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等。这样到50年代中叶，在中国建立起来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个时期，苏联一度被视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建设苏联先后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等。建设计划进行比较顺利，到1957年建立起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制造、发电、冶金、重型机器制造、精密仪表制造和国防军工企业等，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同样非常落后，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把发展文化教育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在扫盲的基础上，大批工农子弟被送入各级学校学习。国家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和大批研究机构。与此同时，针对那些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共非常重视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提出对他们进行改造，他们也很积极地投入学习以适应新社会。然而，在批评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出现随意上纲、群众斗争的现象。

^① 丁守和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各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可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特别是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和对当时在台湾的学者胡适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变成政治斗争，开了以言治罪的先例。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明确今后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提出改进调整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在文化领域，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却使中国前进的方向遭到扭曲。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及对他的个人崇拜。随后，在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群众游行示威的情况。西方国家借此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浪潮。这种形势对中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由于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困难，在全国也发生罢工、罢课、闹事等现象，一些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工作和干部公开提出了批评。一些人借1957年中共进行整风之机，把批评变成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甚至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于是，这年6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大规模地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反右斗争从知识界扩大到其他领域、从中央迅速扩散到地县等基层单位。这场斗争把大批真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向党提意见的人都当成了右派分子。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结果，全国有55万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处置。

反右斗争中形成的错误思潮迅速波及到各个领域。在建设领域中，左倾思想导致急躁冒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要搞“大跃进”。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10年内超英赶美的目标。不同的意见被当作“白旗”。在农业上，粮食产量指标不断提高导致严重的虚报浮夸。合作社合并成为人民公社，搞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工业上，全民大炼钢铁，500多万吨的生产指标翻番，得到却是成为废品的300多万吨土钢，浪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结果是国民经济严重失调，财政收支不平衡，轻工业日用品和农副产品减产，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在文教思想领域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兴无灭资”的

^① 丁守和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8页。

方针，加大了对不同学术观点的政治性批判。

1958年秋冬之后，中共中央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多次召开会议提出压缩调整。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想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却因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一封信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会议中心内容变成反右，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倾斗争。结果，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365万多干部党员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

就在对内政策不断地向左转的同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为了反击台湾当局在沿海地区的挑衅，也表示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政府决定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轰金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此不满，认为这一行动会造成美苏对抗。联系苏联正在推行的同美国搞缓和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中国领导人开始批评苏联要“苏美合作，主宰世界”。1960年4月，中国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现代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7月，苏联撕毁合作协议，撤走专家。随后，两党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中苏关系日益恶化。

主要由于错误经济政策的影响，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受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艰苦，中共中央决定进行重大调整。各个经济部门的调整就是生产规模指标等都要退够；科技、高教、文艺等部门的调整是要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偏向。在历次运动中受过不应有处分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新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经济很快复苏。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大庆油田的开发，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1964年核爆炸试验成功等等。

但由于国内仍存在工作上的困难，特别是党内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担心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全会提出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左”的思想再次抬头，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由此着手抓阶级斗争，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大批文艺作品和一些创作理论遭到批判。1965年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评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批判运动。1966年5月，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提出要

针对“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伴随着红卫兵兴起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派别组织，相互斗争剧烈，社会秩序极大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生产几乎停顿。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无数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同期，中国加强了反帝反修的攻势，特别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强烈地反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逐渐形成了“反帝必反修”的方针。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刚果、巴拿马等国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中国在新独立的国家中赢得了声望，中国开始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然而，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实际上很险峻。1965年，美国直接派兵介入越南的战争。中国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心向越南北方提供了大量的物力人力的支援。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地区摩擦不断。出于对苏联可能发动侵略的估计，中国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其他备战措施。受文革左倾思潮的影响，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恶化。

为了摆脱内外的困境，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之后，毛泽东打算通过“斗、批、改”的方法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但由于没有清算“左”倾错误，动乱继续。1971年9月13日，发生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座机在蒙古坠毁。这一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协助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各项工作出现转机，社会趋向稳定，外交事业也有突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北京。但1974年，身为毛泽东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等人发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这场运动表面上是批判前领导人林彪，实质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抵制整顿，企图乘机打倒周恩来。连周恩来执行的正确的对外政策也被指责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实施夺取党和国家大权的阴谋。在华国锋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于10月6日对“四人帮”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逐步恢复国内的稳定秩序。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损失据估计上5000亿元，教育质量普遍下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拉大了距离，人民生活越发困难。

革命带给中国独立，中国领导人期望继续革命能够使国家摆脱落后的局面，重振昔日的雄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逐步取得

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一方面，中共中央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历史上造成的错误；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抓紧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经过整顿，生产上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1977年、1978年，粮食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二、改革开放阶段

深刻的教训也是一笔财富。中国历经浩劫，迎来了新的时期。1978年5月11日，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光明日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它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鼓励人们“要敢于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摆脱禁区，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性大辩论，形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方针新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在理论界展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决定把党的工作和全国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会议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1980年和1981年先后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邓小平以改革者的勇气、魄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威望而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先从农村展开的。1978年在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等一些地方，农民自行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讲话，明确地对这种责任制的做法给予肯定。9月，中共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这样，到1983年，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这年10月，进而采取了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改制，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在农村进行改革的同时，城市里

面也出现了改革的趋势，城市改革涉及的领域更多，也更复杂，更困难。198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允许个体户采用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以后，中央政府又肯定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广东、福建等地开始出现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经济方式。国营企业也着手改革，其方式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推行经济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也进入试点阶段，如把中央和省管企业下放给城市、组织各种企业联合体、放开单由国家定价的价格体制等等。

与改革并行就是实行对外开放。中央政府先后对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采取原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迅猛，给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了样板。尤其是深圳，它本是面对香港的一个小小的渔村，几年间就一座座高楼平地拔起，一个新工业化城市在兴起。1984年初，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等特区，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自此，对外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主要是明确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各级领导都重视抓经济工作，到1985年为止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9.7%，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平均年增长8.8%。这些数字都大大超过对发展的预期。

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对外交政策也做了调整。首先，根据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决策，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当月，邓小平成为首位出访中国的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其次，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战争可能性的看法发生变化。80年代初，他们不再认为战争正在日益迫近，并着手改

善与苏联的关系。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依附于美苏，也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这就使中国能比较超脱地干好自己的事情。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198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100万人。这样，国家的财力物力就集中起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提出要改变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特权等弊端，促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和人民生活民主化。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试点的经验，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项决定提出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应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它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6年的六中全会更是明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那些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说法流行全国。经过一系列涉及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资、外贸、价格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

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分配不公，收入差别较大；党内腐败现象滋长，社会上不良风气蔓延等情况，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1988年夏出现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种种矛盾使社会出现不安定现象。特别是由于国外文化的传入，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个时期，各种思潮汹涌。有的借助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对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挑战，甚至提出全盘西化。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社会动荡也波及到中共党内。1986年底部分地区出现的学潮导致中国政府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央政府最终借助军队的力量恢复了秩序，在此过程中赵紫阳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领导职务。6月，江泽民开始担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9月，邓小平为改变事实上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表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

当时，中国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另一方面，国内出现工业生产和市场销售都下降的情况，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生活发生困难，社会多种矛盾尖锐。党中央和政府迅速采取了清理整顿公司等措施来改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92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强调加快改革步伐。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的南巡讲话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改革在加速，人们越来越认清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郑重地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我国领导人决定“坚持原则，政策不变，多做工作，利用矛盾，打破制裁”。1992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我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① 其目的就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后来“韬光养晦”成了我国长时期指导对外政策的原则。凭借正确的方针政策，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1996年，我国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千多亿美元。

我国内外政策的成功促使西方国家逐步取消了对我国的制裁，跨国公司更热衷在我国投资设厂。祖国统一的事业也取得进展。1997年7月1日，中英对香港成功地进行了交接，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将澳门交还我国。“一国两制”的构想得到落实。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在改革理论上又有新的突破。它明确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应有多种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等。新的理论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基础。

就在这时，亚洲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韩国等国经济急速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6页。

坡，陷于重重困难之中。经过改革有了一定实力的中国却避开了危机的侵袭，中国领导人一再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多种形式向面临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尽管中国也受到危机的影响，但199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达到7.8%。这场经济危机促使中国在金融等领域加快改革。

1999年5月初，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后，中国民情激愤，群众抗议活动遍及全国。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紧张局面。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政府的讲话中强调绝不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再一次克服了政治上的危机，沿着既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率高居8%，成为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

经历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如何在21世纪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成为中国政府关切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业大国。中国改革之初的突破口是在农村，而改革最后成功与否也在于农村的发展与变化。因此，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又成为政府的工作重心。2000年以来，或在12月下旬或在1月上旬，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工作。相应的从2004年起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凸显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如2000年提出要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2001年提出要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任务。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废止农业税。这是对农民的再一次解放。搞好农村经济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根据2000年的全国农村扶贫标准865元，贫困人口为9400多万；到2013年按照2300元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仍有8200万。^①虽然通过大力开发西部、加强贫困地区建设和各种各样的扶贫开发措施，贫困标准有了提高和贫困人口有了减少，但减贫任务依然十分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新华网，2011年11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1/16/c_111171617.htm。《中国贫困人口超过8200万人，继续向贫困宣战》，国际在线网，2014年10月14日，<http://gb.cri.cn/42071/2014/10/14/6891s4726563.htm>。

严峻。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消除贫困必然是条件之一。

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外贸。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奉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GDP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外贸的增长。这项政策导致中国与不少国家矛盾的增加，因此加入世界贸易机构是减少外贸阻力的当务之急。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成为该组织成员的决议。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在此基础上，中国通过投资的不断扩大、金融体制改革、财税管理改革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等等措施，保证了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GDP能高速增长，其中2007年高达11.4%。^①2010年，中国的GDP总额跃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制造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和美国。中国外汇储备多年来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2014年达到近4万亿美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利益攸关。

经济高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期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和腐败严重等等。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等等，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为此，以民为本成为政府进行治理的重要出发点，各个部门在工作中关注民生。如2006年1月，国务院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还决定着手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从2010年起全面推开；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008年7月，国务院决定从秋季学期起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进一步推动改革，进入深水区，并以前所未有的魄力铁腕反腐，以实现他所提出的“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年之间召开了八次会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改革意见及方案。讨论的内容如财税改革、户籍制度、司法体制、教育改革、科技体制、农村土地流转等，个个都是硬骨头。这一年，为给经济发展松绑，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超过300项，如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许可、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等等。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医保工作的通知》；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宣布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同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公众关注多年的公车改革全面推开；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12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表示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将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每一项改革都牵涉全局、具有根本性意义、并为人们普遍关切。

2014年也是反腐倡廉取得突破的一年。中纪委监察部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治标为主线，以巡视为先锋，打老